



YA
ZHOU
SI XIAO
LONG

亚洲四小龙
腾飞之谜

博高义(美) 翻译 陈振声 校译 梅洁林



中财 80004311

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傅高义 著

陈振声 译

穆洁林 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5 号

出版发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北京学院路 41 号院内)
印 刷：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 数：90 千字
印 张：4.5
印 数：0001-6000 册
书 号：ISBN7-5620-1108-7/D·1060
定 价：4.50 元

**HARVARD NIVERSITY PRESS CAMBRI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1**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1 版本译出

Copyright 1991 by Ezra F. Vogel

本书版权属傅高义所有

**本书已经傅高义先生正式授权陈振声
先生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原版前言

埃德温·赖肖尔 (Edwin Reischauer) 以研究日本的成就而闻名于世,但实际上他研究的领域涉及整个东亚地区。赖肖尔和费正清 (John Fairbank) 共同为东亚研究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所有东亚学者所从事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面对赖肖尔和费正清这两位导师,我们总怀有日本人所说的感激之情。正是他们所创立的东亚研究基金和专门学术机构,使我们今天的研究更为便利。此外,他们还树立了与广大读者密切联系的导师风范。

如果没有前人开拓的东亚研究领域,我们很难把握在东亚所发生的令人目眩的迅疾变化,那么也就无从对当代亚洲进行一切相应的研究。日本作家夏目漱石 (Natsume Soseki) 曾塑造过一位叫三四郎 (San-shiro) 的人物,三四郎在谈到 80 年前的东京时这样说到:“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被摧毁了,同时又被创造出来。”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和描述这样一个世界呢?我想,许多研究

东亚工业化的学者一定能体验到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喜剧角色卓别林面对工业化大机器时的特别感受。在这样的研究领域中,我们不得不坚持不懈地追踪新技术和社会各方面的迅速变化,尽管这在很多方面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我深知要研究所面对的如此多的课题,尚须掌握许多专门知识,因此,我只能努力尝试,尽我所能,效仿埃德温·赖肖尔,向人们提供一幅他曾期望看到的东亚发展的全景。

关于本书的初稿,我十分感谢下列人士的帮助:文森特·勃朗特(Vincent Brardt),卡特·伊克特(Carter Eckert),托马斯·古尔德(Thomas Gold),卢惠芬(Huey-feh Lu),雷格利·诺贝尔(Gregory Noble),宋世南(Byung-Nak Song),埃德温·温克勒(Edwin Winskler)和容杨松(Yang Soo Yoo)。在有关学术问题的探讨方面,我特别感谢在协助我讲授“四小龙”课程中的十几位天才的助教。在编辑方面,我对伊利莎白·格雷兹(Elizabeth Gretz)深表感激。另外,南希·哈思特(Nancy Hearst)帮助誊写了书稿。

傅高义

目 录

原版前言

第一章 工业化新浪潮	(1)
三次工业文明浪潮.....	(3)
科学科技术的变化和影响.....	(5)
二次大战后的新机遇.....	(8)
第二章 台湾	(13)
转向自足经济	(14)
奠定工业化的基石	(15)
台湾工业化的过程	(27)
台湾当局与企业的关系	(31)
企业家阶层	(32)
台湾社会和政治的演变	(36)
第三章 韩国	(39)
朝鲜战争的劫难	(39)
韩国工业化的道路	(41)
韩国政府推进工业化努力	(47)
企业家阶层	(55)
第四章 香港	(60)
香港	(62)
香港当局与香港工业化	(63)
企业家阶层	(65)

第五章 新加坡	(68)
取得统一,政府推动工业化发展	(70)
新加坡企业家与跨国公司企业家	(74)
第六章 结论	(76)
东亚工业化成功的时局因素	(78)
工业化的新儒学	(84)
一个时代的终结	(94)
东亚工业化对世界的影响	(98)
附录：新加坡——驯服的小龙	(102)
第一节 政府:权威与精英政治	(103)
第二节 社会:社会认同工程	(111)
第三节 经济:跨国公司	(117)
第四节 未来:经济转型和常规惯性的 怪圈	(123)
译者后记	(129)

第一章 工业化新浪潮

千百年来，龙在东亚一直是力量和强权的象征。在历史上，雄踞龙首的是中国。然而到了 20 世纪初叶，日本依靠先进的工业基础，取代了中国的地位，一跃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 10 年时间中，重新掀起工业化浪潮，创造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惊人发展速度。在随后的 30 年间，日本周围的四只小龙——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又以更高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日本和四小龙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为什么仅仅是东亚的几个半岛和岛屿能以巨大的发展活力获得如此丰富的成就呢？

日本及四小龙的面积不到世界陆地面积的 1%，人口也不及世界人口的 4%。然而，日本、四小龙却与欧洲和北美一道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三大支柱。1988 年，在世界 17 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和四小龙占了五个席位。从本世纪 60 年代

起,日本和四小龙已控制了世界纺织业和电子工业。日本和韩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造船工业国,同时,它们还是令全世界竞争对手生畏的钢铁和汽车生产国。东京、香港已和纽约、伦敦一同跻身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行列。当今世界上外汇储备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和地区是日本和台湾。日本、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公民及公司控制了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巨额资产,相比之下,欧洲人和北美人在东亚地区所拥的资产数额要小得多。日本及四小龙的经济现在仍以高于世界其它任何地区的速度继续飞跃发展。

本世纪 30 年代,工业化仅被人们视为西方世界所独有的现象。甚至到了 50 年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依然坚持认为,工业化成功主要归结于新教的特殊教义或西方文明所具有的特质。一些学者还曾专门研究过东亚地区的传统是如何阻碍现代化的问题。甚至在 60 年代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东亚已经取得惊人的工业化成就时,一些学者仍坚持认为,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依然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使它们被摈除在工业化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制造工厂已遍及全球,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外,只有在东亚地区工业文明得到了广泛传播,只有这一地区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赶上了西方的水准。到了 90 年代,世界已有 50 亿人口。其中 10 亿人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在这 10 亿人里,有 7.5 亿人居住在工业化的西方,2 亿人口居住在工业化的东亚。

面对如此完善的东亚工业化奇迹,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随之产生出来。一些学者认为东亚的成功应归结于国家工业政策或强大的政权力量的作用,因为在当前的时代中,尽管世

界贸易和国际多边合作不断扩展，国家仍然是一个指导、支持工业发展的基本单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东亚工业的成功仅仅表明自由市场经济的完美成功。虔诚的东亚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东亚的成功源于传统的独特性。而发展计划者们则强调，东亚的成功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为他人提供了效法、学习的经验。而我对东亚工业化成功的解释将使用归纳法，这样做终究免不了有些折衷的意味，可我发现，没有哪个单一的理论或观点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我们所面对的东亚工业化现象。

三次工业文明浪潮

现代化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在本书中我将集中研究工业化问题，即研究机器代替人力而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问题。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在比较研究中突出重点，而且是由于东亚在过去 40 年的演化中，新工业技术是核心内容。毫无疑问，正是新的工业技术使工人投入有限的劳动，获得巨大的产值。为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工业化生产创造出了巨量的财富，使人们的生活标准得以提高。工业化已成为政府活动的主要目标，工厂使社会生活的中心从农村转向城镇，转向城市。但工业化重大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卡尔·普拉叶(Karl Polanyi)在《大变革》一书中指出，机械的采用为创造现代市场经济，为树立人们对物质商品在解决人类问题的效用这一基本信念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讲，这两方面的变化，使人类文明的进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工业化社会这一词汇已说明了我们的思维在认识人类本身及现实社会时，已受到了工

业化进程多么深刻的影响。

我们常以工业革命一词来描述工业化的变革过程。但是在 18 世纪首先由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与发生在二战后 40 年间的东亚四小龙的工业革命有着巨大差别。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今天的工业生产技术更加先进和复杂,而且还因为今天的工业生产组织过程,即从原料提炼、运输到生产、分配和成品进入市场都比从前更加复杂,更加需要高新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技能。

一些学者,如亚历山大·基申克罗尔(Alexander Gershenson)、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和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都使用“晚期工业化者”一词来描述在 19 世纪末追赶上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英国,一定意义上也包括美国,工业化过程具有更多的渐进性的特点。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工人无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便可拥有工作所需的专门技能。按后来的标准,英、美工业化的渐进性过程对资本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英、美工业化所需的大部分资本来自于工业化进程本身。在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曾远远落后于英国,为了迅速赶超英国,他们跃过了那个先锋国家经过的发展阶段,从起跑线上寻求建立崭新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工厂。这些工厂的建立使生产突飞猛进,对资本的需求也大量增加。为了尽快缩小与英国的发展差距,“晚期工业化者”组织正规专门的训练项目和集中的专业研究所,努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资本、培养工人,并试图进行相对剧烈的社会变革而又不引起严重的社会政治骚动,这样就需要一种高层次的协调能力,一种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协调机制。因此在晚期工业化者中,政府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远远比英国政府的作用要大得多。

到 50 年代,正当东亚四小龙开始寻求追赶工业化国家的时候,工业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鸿沟已变得十分巨大。因此,我们可以称四小龙为“后期工业化者”。日本在 30 年仍稍落后于欧洲大陆的主要工业国家,所以日本堪称“后期工业化者”的开路先锋。先进的技术,使得“后期工业化者”比“晚期工业化者”需要同更复杂的工业系统及其它附属体系相适应和融合,同时这些活动需要更高层次上的协调能力。后期工业化者需要从储蓄和借贷中获得资本用于投资,继而以更大的努力获取现代科学技术和产品,建立更为广泛的世界市场网络。在这个追赶进程中表现出卓越才能的日本人,造就了一个能够协调、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政府,必要的时候,这个政府便可以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但日本与社会主义及其它一些可能的后期工业化者不同,它没有严格地计划和限制私人经济资本的发展。恰恰相反,东亚地区的政府支持和鼓励公司发展,而这些公司常常比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公司具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

科学技术的变化和影响

虽然我集中研究的问题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隨的社会组织,但探讨一下科学技术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起,人们可以划分出五次大的新科学技术浪潮。促进英国工业化雏形的第一次科技浪潮始于纺织业,在这个行业中,持续不断的机械进步使制造工业取代了手工业。在欧洲大陆国家开始追赶英国的时期,出现了第二次科技浪潮,它以钢铁制造业为主要标志,继而便是煤矿开采业的

迅速崛起。新兴重工业需要大批量货物运输的能力,这就导致了蒸汽机的发明,并随之产生了汽船和火车发动机。而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第三次浪潮,它使汽车的产生变成现实,这随之促进了石油及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以及公路、高速公路水平的迅速提高。此次浪潮始于欧洲大陆国家已经向工业化迈进了几个阶段之后。以电子消费品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浪潮则始于四小龙工业化之初期。以计算机和电子通讯为主要内容的第五次科技浪潮则发生在四小龙经济起飞的年代,这次科技浪潮又导致了生物技术、光电和新材料等先进技术的产生。

英国羊毛业促进了纺织业的产生,但是使这雏形工业革命起飞的是棉花业而非羊毛业。因为一方面棉纤维的强度足以使它符合机械化生产的要求,另一方面廉价的棉花种植业比羊群发展得更为迅速。四小龙的工业革命也正是从棉花种植业开始的。但是,随着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坚固耐用的合成纤维成为比棉花更为廉价、供应更及时更广泛的纺织工业原料。至此,纺织工业生产技术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纺织机械成为最廉价的商品,人们可以用最低廉的价格购买纺织机械。处于经济起飞之中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已具备足够财力购买纺织机械,并利用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从事纺织业,从中获利。东亚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在服装业尤其明显,与纺织业相比较,服装业是更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钢铁与蒸汽发动机制造业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从它而使德国和美国超过了英国,重工业的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大量增加。在东亚,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感到自身经济规模太小,难以进行如此的巨额投资。韩国在 70 年代大胆投资于重工

业,巨大的投资数额曾使韩国处于疲于支撑的局面。正当台湾和韩国开始实现各种突破时,曾给欧洲以点经济带来高速增长的铁路,因内燃机的充分发展,已被汽车运输,高速公路所代替。到了50年代,石油已经开始将煤取而代之,成为重工业的原料,因此同早期的工业革命国家相比较,台湾、韩国重工业对煤炭的需求量是很小的。

电子消费品和家庭电器行业这场新的革命为东亚工业化飞跃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契机。电已在全世界广泛使用,新的发明产生了许多新的消费品。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生活水准的提高促进了大众市场的发展。与上述的纺织业一样,电子产品制造业并不需要巨额投资,需要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这样,一些具有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就拥有了先天的优势。

新型计算机和电子通讯技术对东亚具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最初,东亚国家和地区没有大规模从事这一方面的生产。但后来在东亚经济起飞之时,计算机和电子通讯业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这些发明使全世界的信息更加容易地汇集起来,从而使东亚具有了迅速取得先进技术和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新工业化国家几乎都同时经历了上述五次科技浪潮的影响。诚然,蒸汽机、煤和铁路都已被淘汰。但是,在以前的几次浪潮中产生的现经过新改进的技术仍在发挥着效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正是从拥有相对廉价机械,从事纺织业和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开始的,然后再逐步使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提高他们自身的效率。随着新工业国家资本的不断积累增殖,及其本身组织能力提高,使他们对各种国内外的资本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因此他

们也更具有能力购置重工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设备。

二次大战后的新机遇

二次大战后，工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变得空前巨大，而这个鸿沟需要人们为之付出大量艰辛的努力才有可能跨越。与此同时，一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使后期工业者们可以从世界市场中获取本身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和经验。

冷战与科学技术的分享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工业强国，它允许甚至鼓励本国的科学技术流向盟国，与他们共同分享科技利益。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领导人一直愿意对同盟者给予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当时，美国在工业科技和生活水准方面遥遥领先于其它主要发达国家，因此很少考虑本国与外国分享科技利益，向国外投资，开放本国市场等行动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在从前的历史中，英国严禁工业科技出口。与此相反，美国军队乐意与同盟国分享和使用其先进的装备，美国政府也不禁止在自由世界中私人科技的转让，美国的大学欢迎和接收外国的学生。

国际贸易的扩展 二次大战后，国际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国家贸易体制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从 16 世纪重商主义开始到二次大战结束时，关税和海关一直严格地限制着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商品资源并非一应俱全，所以工业化国家都发展各自的殖民地，以保持对殖民地资源的控制。在一次大战前的几十年里，国际贸易和投资曾有很大发展，一战后这一发展趋势又再次得以扩展。但是

这种趋势因 1930 年斯莫特——海莱法(Smoot—Howley)的颁布而终止,该法案加剧了世界经济萧条。

1939 年的慕尼黑事件中,正是由于各国对希特勒妥协退让,最终导致悲剧性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有鉴于此,战后计划者们决心反对任何集权主义的侵略。由于斯莫特——海莱法提高了关税,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性的经济萧条,这些因素使战后计划者们决心保持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制。美国带头建立了 1944 年的布雷顿·伍兹(Bretton Woods)货币协议,1947 年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和 1962—1967 年的贸易谈判中的肯尼迪回合,所有以上协定铺平了世界贸易高速发展的道路。当然,另外一些因素如运输交通业的发展,资本拥有者在全世界的广泛投资,未发生干扰破坏贸易发展的战争等,这一切都促进了国际贸易量的巨幅增长。从 1960 年至 1980 年间,美国进口商品价值增长了 20 倍,即从 150 亿美元上升为 3400 亿美元。在 1960 年,美国从日本购买的商品价值为 11 亿美元,1985 年所购商品价值为 688 亿美元,25 年里上升了 60 倍。美国进口商品在美国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1960 年的不足 6% 上升到 1980 年的 22%。欧洲和东亚以及其它国家都在更大程度上参加了国际贸易。一些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为世界市场生产所需商品,从中获取利益,从而发达致富。

大众消费的增长 欧洲特别是北美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这些地区一般家庭的购买力迅速增强。随着大众媒介和公众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和购买大卫·伦斯曼(David Riesman)所称的“成套大件”消费品。在美国,因汽车和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使市场革命成为可能。由于大规模的百货市场和大众超级市场代替了小型的街坊式的零售店,使